

安克強著，劉喆譯，《鐮刀與城市：以上海為例的死亡社會史研究》，上海：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，2022年，402頁。

安克強所著《鐮刀與城市：以上海為例的死亡社會史研究》是近代中國城市史研究領域一部具有方法論突破意義的力作。作者以「鐮刀」般的精準剖析，聚焦上海城市肌理中常被忽視的毛細血管——死亡及其管理，通過對墓地糾紛、屍柩處置、火葬推廣等喪葬實踐的深入考察，揭示了城市化進程中交織於死亡管理背後的權力網絡、資本邏輯與記憶政治，開拓了城市社會史研究的新維度。

作者在中文版序言中指出，中國文化為死亡構築了一道厚重的「無聲之牆」（第6頁），導致中國學界相關研究長期屬於人類學領域，且研究重心偏向鄉村社會喪葬習俗。在此學科壁壘之下，城市史研究雖以日常生活為考察對象，死亡議題卻近乎隱沒，針對近代城市死亡管理的系統性歷史研究付之闕如。相較之下，歐洲死亡史研究已形成深厚傳統：菲力浦·阿利埃斯（Philippe Ariès）開創的死亡文化史研究範式影響深遠，英國史學界在死亡空間變遷、殯葬商品化、哀悼情感史等領域均有突出貢獻，但既有歐洲研究缺乏對中國都市經驗的比較視角。聚焦上海研究領域，顧德曼（Bryna Goodman）對同鄉會網絡的研究雖具開拓性，但僅零星涉及死亡管理；日本學者帆刈浩之雖指出同鄉網絡在死亡處置中的作用，卻未展開系統論證。由此，作者獨闢蹊徑，擺脫文化史闡釋框架，聚焦於近代上海「死亡管理」的物質實踐，並將其確立為透視城市現代性的關鍵棱鏡。

全書結構清晰：首章考證近代上海的高死亡率，揭示「東方巴黎」繁華表象下移民群體的真實生存困境。第二章分析上海會館公所等同鄉組織的死亡管理功能（義塚營建、殯舍運營、施棺助葬、運柩回鄉），指出這些實踐是移民構建身認同的重要媒介，既延續了顧德曼對上海同鄉組織社會功能的深刻洞察，又深化了學界對同鄉網絡在死亡管理領域中關鍵作用的認識。隨着傳統會館逐漸式微，新興殯葬公司填補了市場空白，第三章詳述其商業化轉型軌跡，特別指出抗戰時期日軍對上海周邊交通的軍事管制，客觀上加速了屍體作為特殊商品的流通進程，靈柩滯留激增催生殯葬行業的非常態擴張。

第四章考察上海墓葬空間的嬗變，闡明租界當局以「衛生現代性」之名驅逐傳統義塚與會館墓地的行為，內蘊文明等級論的殖民話語。第五章通過

對比西人墓地規劃差異，解構空間演變映射的族群不平等。第六章聚焦城市邊緣群體，指出善堂善會系統化的露屍收殮機制，反而將貧民死亡事件系統性地排除在公眾記憶之外。這種「死無人知」現象與第七章揭示的葬禮等級秩序形成互文：精英通過奢華葬儀鞏固家族聲望，底層貧民則依賴同鄉互助或善堂救濟，差異化的喪葬實踐成為社會分層的重要標尺。第八章剖析火葬從習俗禁忌到現代政府規訓工具的轉型。最終章延伸至1949年後，探討新政權殯葬改革如何改變行業生態，並深刻重構民眾對死亡處置的集體認知。

全書通過時空縱橫的立體圖景，為理解城市現代化進程中的生命政治提供了獨特視角。其核心理論突破可從空間與時間兩個維度解析：在空間維度，死亡管理與城市化進程的互動構成了理解現代性的關鍵密碼。開埠後上海城市化高速吞噬鄉土社會的物質形態，而喪葬習俗作為傳統社會的堡壘，與之形成了尖銳對立。第二、四、五章超越對墓地作為靜態文化空間的解讀，將其還原為權力博弈的動態場域。墓地隨城市擴張不斷外遷的軌跡，正隱含傅柯式生命政治對空間的重塑：歐美僑民佔據中心墓區，印度人、越南人被排擠至邊緣，華人寄柩所更成為空間爭奪的爆發點（如四明公所事件）。這不僅是現代公共衛生與華人「落葉歸根」喪葬倫理的文化衝突，更是城市土地資本化經濟邏輯的體現。當生者對土地租金與產值的需求日漸膨脹，死者便淪為必須驅逐的「他者」。

死亡管理空間擠壓趨勢的極端後果體現於城市的邊緣。普善山莊1915—1954年間收殮近85萬具無主屍骸的驚人數字，與媒體競相報導的精英葬儀形成刺目對比。阿岡本(Giorgio Agamben)筆下的「赤裸生命」(bare life)——被剝奪政治身與社會保障的難民貧民，淪為善堂簿冊中的統計數據，官方檔案對此集體失聲。死亡處置的差異折射階層鴻溝，歷史記憶的建構更強化了此種不平等。抗戰時期租界難民激增導致露屍問題空前嚴峻，然市政當局僅將其界定為衛生隱患，藉機推廣火葬，使火葬與貧困的符號關聯進一步強化，被視為懲罰性的「社會詛咒」。而當無主屍骸從物理空間被清除的同時，城市化進程中結構性暴力的歷史記憶亦被掩蓋。

在時間縱深層面：死亡空間的商品化本質挑戰了「陰陽相隔」的傳統認知，構成該書理解城市死亡管理的另一維度。除第三章對商業殯儀館的考察外，第二章揭示的同鄉會館互助性殯葬服務，同樣折射出殯葬行業從倫理實踐向商品交易的深層嬗變。當「事死如事生」的傳統倫理被重構為跨越陰陽的經濟契約，棺柩寄存費用隨時間遞增的定價機制，實將孝道責任轉化為可計量、可延展的經濟負擔。死亡從未真正「結束」，而是持續消耗生者資

源。第七章對不同等級棺木價差達15倍的分析，更在死亡場域刻畫出權力階序。至抗戰時期，日軍切斷傳統運柩通道，迫使大量棺柩長期滯留滬上寄柩所。臨時殯舍異化為具有持續盈利能力的租賃場域，揭示出近代上海獨特的「生死共域」形態——生者世界對空間的經濟榨取，已滲透至死者棲身的最後領域。當殯葬服務被整合進城市資本積累與權力運作的複雜體系，死亡管理遂從倫理實踐轉變為牟利標的。

概言之，從殖民權力對城市空間和集體記憶的重構，到資本邏輯對喪葬倫理的解構，該書最終指向一個核心命題：近代上海的死亡管理不僅是文化觀念的投射，更是移民社會資源分配、城市化壓力、國家權力滲透與社會控制的縮影。這一分析框架填補了近代中國死亡社會史的研究空白，並在中國語境下回應了阿利埃斯「死亡是文化表徵」的觀點。全書以死亡管理為稜鏡，切割出人口流動、經濟運作、空間博弈、政治規訓與觀念演變等多重歷史斷面。通過考察官方機構、民間組織與商業公司在死亡管理體系中的角色嬗變，作者展現出移民社群互助機制、殯葬商業化進程、公共衛生訴求與土地財政邏輯的複雜博弈。尤為重要的是，作者將戰爭與革命的歷史主線與死亡管理的意識形態變遷相勾連，揭示出政權更迭背景下社會治理技術的延續與斷裂。

此外，在史料運用上，本書考據相當扎實：一方面，深度開發上海檔案館藏租界檔案、同鄉會賬簿等原始文獻，修正近代上海人口死亡率估算數據，還原公墓選址爭議、寄柩所經濟運作等具體實踐；另一方面，系統整合地圖、歷史照片等視覺材料，藉助GIS技術復原墓地空間變遷軌跡，直觀呈現出城市擴張與死亡空間的動態博弈。文本與圖像的多維互證，構築了微觀考察的堅實基礎。

綜上，《鐮刀與城市》以鋒利的隱喻刺破了現代性敘事的浪漫想像，將死亡管理確立為解剖上海現代性悖論的核心稜鏡。這座百年間崛起為四百萬級人口規模的世界都會，其光鮮圖景始終與屍骸處置困境的陰暗面相伴相生。該書的價值已超越地方史範疇，既為中國死亡社會史研究提供了可資借鑑的分析框架，更深刻揭示出：近代城市化進程的背後，實為生存空間拓展與死亡管控技術的持續博弈。死亡從未退出城市文明的舞臺，而是始終作為權力滲透、資本循環與身建構的運作場域，深度參與現代性方案的實踐與再生產。

吳雨桐

中山大學歷史學系（珠海）